



The Silver Wings

the Local Society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China

[增订本]

银翅

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庄孔韶 著

The Silver Wings

the Local Society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China

[增订本]

银翅

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庄孔韶 著

Copyright © 2016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 庄孔韶著. —增订本. —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6.6

ISBN 978-7-80768-087-1

I . ①银… II . ①庄… III . ①福建省—地方史—研究

IV . ① 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8616 号

图书策划 杨震林

责任编辑 肖 严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0.75

字 数 427 千字 图 7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52612 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再版前言

《银翅》的中文版首发于1996年(台湾桂冠书局),其最初写作可追溯至1989—1990年,而后在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期间(1990—1992)续写、修订并完成,它属于改革开放后呈现的第一批讨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著作之一。

20多年来,中国乡村人类学和历史学过从甚密,最大特点是点和面的研究都得以深化。那么,回过头来又如何面对“儒学教化”(the Confucian project)的老题目呢?“中国化模型”(the sinicization model 或直言不讳的“汉化模型”)讲的是儒学怎样如墨渍弥散式地进入传统帝国的边缘社群,完成一统天下的梦想;笔者主要思考的则是“帝国”从上到下如何传递儒家理念,从而实现“濡化”与“德化”的内在社群问题。和早期人类学考察相对孤立与无文字部落社会的不同之处是,面对“中华帝国”有必要深度关注文字载体与农本社群的长期交互作用模式,即儒家理念何以长久地大面积“过化”,以此在方法论意义上思考该如何研究中国。

本书的田野工作与书斋分析正是强调早已先在的儒学理念如何“为哲学家所发明、政治家所强化、教育家和乡土文人传播,并最终由农人所实践”,这是一个动态的、携带着传承与应变的中国文化过程,也是田野反观法的观察基础。由文字一统引申的儒学理念和农本社群结合,笔者并没有单一倚重西方学术圈着力强调的权力的支配性视角,而是把儒学的“理念先在”意义容纳进“中国化模型”之中并使之转向。似乎唯物主义和功能主义都回避或忽略了这一点。

学术同行也注意到近年来关于中心—边缘的深度点状研究，应该说，被认为是“去中国化”的某些研究议题实质上难能可贵地凸显了大面积“中国化”历史过程中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文化涵化效应。

当然，这本书也回答了金翼之家何以跨越时空再次成功“察机”，^①以银耳科技作为家族主义的新动力，冲击三十年重农主义的藩篱，率先窜出“平衡”的系统，开启新农村之路。

笔者强调，最后一章是想把田野中文化的直觉发现“抛”给经典研究的哲学家，意在找到中国古代文献的深厚哲理的落脚点，以及增加剖析文化直觉的群体性和场景性田野实践。显然，说到人类学家的亲历和体认，文化的直觉是一个不能在论文中忽略和放弃的人际的精灵，尽管我们只能小心地梳理它难以捉摸的思维历程。

感谢三联生活书店的积极支持，能够在我的导师林耀华先生1944年原始版《金翼》中译本面世的同时，让其学术性续本《银翅》得以再度刊行。

庄孔韶

2014年10月16日

① 庄孔韶，《金翼家族百年过程的学术研究要义》，见庄孔韶《行旅悟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6—140页。

林耀华序

我已经 40 多年没有回《金翼》故事里的黄村故乡了。庄孔韶博士说，起初他透过我的《金翼》首次认识了福建乡镇社会的过去；如今我则从他的学术性续本《银翅》很快发现我家乡变迁中一脉相承的历史关联性。我始终相信，人类学对当代中国文化本质的研究不能脱离上述分析的基础。不过，人类学家是否能在田野工作中认识这一点，则是另外的问题。

最近十余年，大陆学生、学者有机会出国学习和进修，了解主要来自欧美的人类学理论，受益不少；又，由于他们有不平静社会进程及其教训的体验，于是他们乐于采纳吸收、消化、修正和创新的社会科学学习态度，其落脚点是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在这方面，一些台湾的学者也有类似见解。关于中国的田野研究作品，不但应在形式上是人类学的，而且是人类学赞成的，即提供一个文化的视野——相同的与不尽相同的文化的体验和文化的展示，其中当然包含不容忽视的方法论问题，乃至人类学作品写作构成的文化特征。因此，东西两半球不同文字学术圈之间的作品交流是必要的。庄博士的《银翅》就是这样的一部重要著作。

不仅如此，庄博士和他的一个摄制小组还在福建闽江边拍摄了《端午节》，记录了地方农家生活、龙舟竞渡和游神场景，（我再次看到了童稚时熟悉的小镇风貌，那就是《金翼》里描述过的！）我想，无论是该片的普及版还是学术版，都适于配合《金翼》《银翅》成为一个系列作品，使读者方便了解中国地方社会百年变迁的多重领域。

记得十年前听取庄博士向我报告阅读《金翼》的心得时，我看出他重访黄村所在乡镇的意向，他还和我约时间核对书中众多地名与人名更改前的真实称谓。后来他真的制订了调查和写作计划，我鼓励他，每次从福建调查回京，他都来我的书房与我一同切磋。直到最近几年他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我们也一直有信件交往。现在，庄博士所花的时间和心血没有白费，我衷心地祝贺他的《银翅》中文版问世以及他在发展中国人类学上的贡献。

1995年1月27日于北京

黄树民荐言

这是一部观察入微、文笔细腻、叙事长远的反思性民族志 (reflexive ethnography)。庄孔韶教授回溯其导师林耀华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闽东一个乡间“黄村”的田野调查，依其所著《金翼》一书对黄、张两个家族在上一世纪前期的发展，探索其兴衰轮替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在前书翔实的历史资料基础上，庄教授的大作《银翅》可说是《金翼》的续篇。庄教授在本书中借探寻黄、张两家族后裔在近年的转变与发展，来归纳、分析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历程中所面临的变与不变。这包括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共建政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运转等，对当代中国农村家族、宗族、民间信仰、儒家伦理等各层社会文化面向深浅不一的影响。除引用闽东农村第一手社会史数据外，庄教授更系统回顾当代西方人类学重要理论发展，与台湾学界对中国农村现代化所提出的见解与假设，糅合于一堂。对有意了解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何以会出现如此坎坷多难困境的研究者，应可在本书中寻得满意的答案。

台湾“中研院”院士 黄树民

2014 年 8 月 15 日

作者导言

1984年，林耀华教授把他的英文著作《金翼》(*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 by Lin Yueh Hwa, Kegan Paul, London, 1948)借给我阅读，他细腻的人类学、社会学观察深深打动了我。《金翼》在1944年和1948年首先用英文在美国和英国出版，现在已有了两个中文译本（宋和译本，桂冠图书公司，台湾，1977；庄孔韶、林宗成译本，三联书店，北京，1989；香港，1991）。该书为学术著作，却使用了小说的形式，林师以中国福建省闽江边乡村的两个农人家族兴衰为线索，描写和分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地方农业、商业、船运、政治、法律、教育、宗教、宗族家族以及民俗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生活。该书被当时著名人类学家费斯(Raymond Firth)赞誉为：“如竹叶一般，它简朴的形式下却隐藏着高度的艺术。”《金翼》与一般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全书最后一章为学术总结，告诉读者人类学、社会学是如何发现农民生活变迁的原因。然而自1936年、1937年林先生写作《金翼》前的最后两次田野调查，距今已逾半个世纪，其间社会沧桑与人事迁移，黄村及其所在县镇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人类学如何提供新的乡土民族志并发现进一步的解释性理论和方法论呢？这是笔者后来重访“金翼”黄村时经常思考的问题。

1986年至1989年，我5次访问了《金翼》一书描写的同一县镇，追踪金翼之家的后裔和书中尚存者，访谈400余人。在累积一年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后，开始我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之撰写。笔者发现，20世纪中叶以后，金翼之家

在相当长时间内失去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如果本书仅循着东林家后代人物关系，展开续本的构架将会受到相当的局限，于是改为以金翼之家后辈生活经历与地方县镇众多人物事件相互穿插的社区过程研究，尤其强调田野工作与中国哲学、历史文献、人物思想、政治过程与文化行为的关联分析。现在，这部《银翅》对《金翼》而言，已非一般性故事续本的设计，也没有采纳英语学术圈通行的“标准”论文的单一写法，而是使它成为一部由浅入深的随笔、民族志、分析与论证等方法合一的学术作品。

重访金翼黄村的随笔首先给关心东林后人的读者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文人喜欢的引子。为了做些历史的补充，我追述了金翼之家的族源、玉田县的土地制和租佃制，对田赋过程做了人类学观察。当我触及人类学关于基层社会结构的题目时，不仅可以看到清代末期和民国初期，福建乡镇社会实际延续下来的旧绅阶层与新绅之分化；而且发现了在人类学中一直被忽略的军人角色，这使我得到一个“汉堡包”——有军人卷入的中国乡镇县社会的层位结构之论述。

黄村土地改革纪实，包含了群众大会、划分阶级和志司之死的过程，阐明了1949年革命前后的县乡社会结构之区别。通过人类学考察，我注意到在激烈的阶级原则下，旧的文化协调方式仍微弱地存在着，文化关联并非全然消失。互助组时期农人的热情没有在合作化时期继续保持下去，在本质上并不是过高估计农民合作的积极性，而是集体化的构想及其实施未能与农人的思维、乡村制度与文化相协调，人类自愿原则未能得到尊重，个人利益未能在一种经济联合体中得到照顾，然而一种表面的合作积极性却掩盖了政治的迫力。我把人民公社运动称之为后一张鲁社会大实验，涉及毛泽东人民公社思想渊源及其脉络的扩大分析，包括人民公社进程和它的严重后果，并与中央政策过程相结合加以说明。那时社会组织特征和上下层沟通的蚌状结构是乌托邦社会改造思想推行与盲从的基础。笔者有兴趣继续讨论中国乡村社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位置，对思想和政策文献之梳

理表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与权力之争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不过是一个附属地带。农村基层的“路线斗争与夺权”仅仅是上层角力的一个下层延续。应该重视的学术问题是：毛泽东及其拥护者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贯彻在20世纪初未曾实施的岳麓山新村计划，以及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失败了的乡村社会改造理论。

在未曾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农人生存方式的调节是巧妙进行的。笔者提供了金翼之家、黄村乃至玉田县新生计、银耳等食用菌在民间培植与推广的社会过程，民族志反映了福建地方文化两大特征之相互谐调，以及地方农人绕过“极左”政策压抑而发展新生计的才智。随后，人民公社体制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责任制之适应性转换，可视为政治对文化的妥协，即承认文化的连续性和否定文化中断的可能性。邓小平的生产责任制的确使农人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生计的机会。笔者以与各类人士的访谈记录分析和夹叙夹议的形式，反映出生产责任制在黄村的实施过程、农产品价格“双轨制”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过程、新稻种推广的上下级事务过程，也反映出在细碎土地上实行农业现代化的艰难以及乡镇发展的利益之争。然而，福建地方农人的确在一个政策宽松的时期出色地安排了自己的生态农业，同时也在盼望乡镇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之新改观。

曾参与过明河船运和省城、县镇商业活动的金翼之家，在20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与后来漫长的集体化时期也有颇多变故。这使我有兴趣继续了解明河码头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并尝试对县以下之财政税收诸流通环节的运转做人类学分析。可以看到，旧流通体制危机之症结出于其组织形式、干部队伍、流通过程和法制。笔者希望透过粮食和土产的税收过程提供社会团体与农人利益关系的分析。

本书以三个较长的章节讨论宗族、房和家族问题。以古今史料与田野观察阐明中国人祭祖的根本原理是理念而非功利，与财产继承无关。设祭产、写族谱、宗族形式与组织，乃至伦理教化都是强化宗族血缘团体的措施。当代中国宗族族群认同及其先在的理念仍超乎功利

的目的，乡村循礼亦总是表现出鲜明的宗族与房的族群关系原则。笔者还乐于讨论房与宗族的结构关系、宗族精神与自我实现的相互依赖性。应该说人口再生产和宗祧理念是中国亲属团体过程中永动的源泉。世代父子宗祧继承的这一中国人宗族家族文化价值观为哲学家所发明、政治家所强化、教育家和乡土文人所传播，最终由基层人民所实践，从而成为中国人族群的重要精神支柱与行为准则。宗族、房和家族作为亲属团体的不同形态，均是亲属关系生物性与人伦哲学及社会秩序整合的结果，这促使笔者不仅注意到中国宗族和房的变化特征，还注意到一些流行的家族形态变体。在随后的家族问题分析中，笔者认定，在中国准一组合家族分布地区，使用目前诸人文社会学科通行的家族术语如核心（nuclear）、主干（stem）、扩大和组合（extended and joint）家族，虽说可以提供若干时间断面各类家族构成及其变迁趋势，但在家族成员关系上以及动态的、具有很大变通性的家族联结结构则需要做文化上的进一步解说。

笔者分三个历史年份（1953年、1975年和1986年）讨论金翼之家及其所在大黄村的家族形态变迁。前革命时期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改观，传统生育文化观念与土地改革后农家生计改善以及推广新法接生相结合，促进了人口增长。然而，通过1953年的户籍分析，笔者惊奇地发现单身家族（single family）一直占相当比率地存在着。这一社会现象其实是社区环境与文化规矩互动的不幸结果，同时，其他类家族也表现为形态上的发育不全和残破。随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发育不全和残破的各类家族逐渐成长起来。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政策为中国人多子理念和这一类型家族人口的膨胀提供了再实现的条件，呈现了一个由平均主义的社区体制、人口增长难于制止和农业经济低度发展的循环圈。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黄村各类家族发育之明显改观。生产责任制与家族生计单位吻合的新政策促进了个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农人成就大家族的愿望。黄村家族结构的40年变迁反映了这一趋向，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与农人生育愿望相背离，于是超生、瞒报、漏报人口成了农人生

活的应对方式，随之出现的结果还有男女比例失调，以及诸家族形制之膨胀比一般公布的统计数字更为显著。笔者还看到，地方农人在可选择多种组合形式的一些生计活动中，总是乐于将其纳入家族主义的安排。

当我们把史料记录和现今存在的家族形态相关联，会发现一些曾被注意和未被注意的大家族存在与维持的若干原因，仍值得做新的讨论和检视，例如性爱限制便是其一。同时，笔者也尝试提供福建农人家族分化的两类常见过程及其地方性差异。至于人们对家族形态的选择，既是各地中国人理解保持家族主义、父子联系原则的反映，又是地方家族结构变通与家族关系协调的产物。笔者建议把大陆和台湾存在或分别存在的轮值（meal rotation）、反哺（back-feed）和联邦（federal）三类家族合称为中国式准一组合家族（chinese quasi-joint family），一方面说明目前准一组合家族形态成为研究中国家族结合方式古今关联与变迁的重点，一方面也是试图与学术界常用家族术语：核心、主干、扩大和组合家族系列相协调，而后面这几类家族术语均不能套用于若干中国家族的变通形态之中。显然，占用了相当篇幅讨论关于中国式准一组合家族形态成因、结构特征及其演化（已出现对少数民族族群的影响）是有价值的。此外，所涉及的传统中国宗家主义原则和法律进程的关系，无疑是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个兴趣所在，笔者对金翼之家后辈房产纠纷的历史原委、珍贵法律文献的对照以及实地事件与人物的深度采访，意在给读者一个中国人家族纠纷过程的活生生画面。

道教和民间信仰在福建地方有广泛的影响，黄村所在的乡镇刚好处于陈靖姑女神信仰发生地。笔者对该信仰的产生、传播及其大小信仰圈层活动和它对地方民俗与人生过程的影响，做了尽可能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我们所看到的是，以大小宫庙为中心的信仰圈和道士、师公道场的游走活动圈并不一定重合，自然村界与行政村界并不具有局限的意义。信仰的诸圈层的概念，基本上是宗教过程上的，而主要不是组织上的。因为中国民众信仰的主旨历来偏重于家族与个人的生命意义，陈靖姑信仰圈提供给进香农人对人生与世界的解释系统，从而

达成思想上的寄托，却不能给整个社区及其民众提供一个持久的社会组织系统。我们还会看到，地方农人如何老练地调度宗教和科学这“两辆不会碰撞的车”，使二者冲突各得其所地得到功能上的整合。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几个不同类型的道士活动特征，从而认识到由宫观道士和正一派、闾山派住家道士、师公等连接起来的从高层到基层相互认同的道教系统，具有其层次过渡和转换的细密性与互补性。道教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脱离俗世的乡土依恋，把天道和人性融合在一起，并协调于普遍的中国人解释系统，因而，道教在基层社会至今具有永久的生命力。而地方佛教与寺院则不同，入寺者和一般民众之间表现了相当的思想与仪式隔阂，只有观光性质的佛寺进香活动的盛大与辉煌之形，却没有如道教、民间信仰对农民生活强烈渗透之实。

把思想史料、地方志分析和人类学田野工作相结合，考察中国传统儒学及其制度的实践性，这一做法可以说相当引人兴味。如果说孔子只是试图整理和继承西周体制文德，奔走倡导，那么，朱熹则是将政治、伦理、哲学紧密纳入正规与非正规教育形式之中，有目的、有意识和卓有成效地传播理学思想并使其制度化、民俗化。黄村和玉田民间实况表明，儒学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环境与人文基础，历史上儒学成功的传布以及循吏、乡村文人的文化责任感，有力地、不停顿地推动着思想对制度的影响以及高层文化与基层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从而总是可以找到其关联的文化持续性。还有，儒道思想都成功地贯通于中国精英—通俗文化两个层面。笔者在福建熟悉的乡村“先生”——就是这类活跃的文化媒人——他们人数众多，从古至今一直是上下层文化（或偏下层）关联和儒道交接的合适中间人，他们吸附儒道之不同社会理念，使之整合于自身，再巧妙地导入与融合于民间礼俗与信仰中。乡村大众处世哲学中，一些流行的格言谚语反映了民众简化、变通或扭曲儒学本意的适应性生活需要。显然，由哲理到经世致用的过程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转换是以各不相同的结果呈现的。

笔者指出了外来基督教文化项目的两期过程。第一期过程中，外国传教士既扮演了布道者的角色（起初借助了炮舰政治），又是近现代新学的传播者，他们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分化。第二期过程中，外国传教士被中国教牧人员取而代之，无神论处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而基督教、道教和佛教均相当孤立地存在于社会活动之一隅且受到政治的压迫。“文化大革命”后，人们对心理和精神创伤之修复，以及对政治之不信任，导致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复兴”，乡镇基督教出现了自组的“星期家庭聚会”。人类学一方面寻找宗教信仰之社会文化原因，一方面探讨基督教文化项目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宣道理论及其实践。基督教宣道之所成或者乡村教徒与民间信仰生活之隔阂，仍然反映了至今存在的跨文化协调性和文化竞对的不同状态。

借助黄村所在县镇的一个平面示意图，可以比较直观地做出社区社会与文化的解说。在中国城乡连续体的底端，宗族、姓氏团体的血缘与地域观念具有持久的传统。上至政治文化下至宗族文化，都对集市、镇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制约作用。商业和市场行为实质上经常表现为一种文化的经济。还有，城镇的产生有其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的诸种原因，但政治文化不时促成或约束城镇功能的选择，县城则提供了地方姓氏集团角逐及其利益协调的最后的舞台。笔者以地方渔政会议实例说明省、地区、县、镇和村地方权力组织和个人关系的运作过程，提出类蛛网式社会结构的解释模式和新均衡论。该模式和理论并不太过于抽象，其中，中心点原则以及层级性关联的构架、网状结构之破损修复功能与韧性是相当明显的。团体在网络中之运作往往并不受意识形态和已认可的组织原则之牵制，而呈现出极大的变通性。并因社会之不流动性造成盘根错节的网状片断，易衍生历史性矛盾。在目标与利益变动的过程中，团体易于重组。在20世纪80年代凸显出来的市场经济原则开始嵌入类蛛网结构。网络中力的格局变化是不得已的，该网络时而出现不均衡、不安定状态，以及显示破损、修补和编织的、力求片段与整体达成整合与平衡的过程。

笔者对比了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文化结构差异，以及本书关于

中国文化过程的实例论述，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反观法（the look-back method），特别应用于以田野工作为重心的中国人类学。中国文化作为一个一直未被打乱的宇宙观，其思想、知识制度与行为系统总有可寻的传承线索。高层文化与基层文化之间的历史性传递及其关联过程，提供了人类学田野工作反向观察与寻找文化解释的基础；作为主流之一的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目标达成千余年，政治、道德、教育、礼制相互渗透且合为一体，主要表现为单向从高层输导至基层，故反观法的文化理解具有优先考虑田野工作方法的地位。文化的层化分析只不过是方便找到文化关联的线索，然而并不排除上下文化过程中的互补性及变异性的观察，如民俗信条与儒家思想的差别与偏离，均离不开反观法对高层经典、理念和制度性要义的参照性比较。可以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存在主体成分并具有兼容性、关联性和变异性的整合过程，因此，反观法总可以为基层大众文化意识及其行为提供解释与鉴别的途径，从而避免在中国人类学撰述中出现单纯田野行为判断之缺陷。

中国文化的直觉主义（cultural intuitionism）是在逻辑的、功能的、经验的、分析的、文献的以及统计的等研究方式外，容易忽略但十分重要的直觉观察与直觉理解的方法论。笔者力求做扩大的讨论，以阐明中国哲学中的直觉主义传统，包括道德的直觉、人伦相对性直觉，以及作为一种转换的文化直觉的群体特征与场合性特征。关于文化直觉的人类学解说还涉及写作与阅读的直觉、文化直觉的社会性记录和教育过程的直觉，笔者对此做了隐喻与直觉的详细解释。笔者认为，人类学家应有文化的直觉能力，这包括对有明确涵义的符号和对不明确的隐喻的理解。因此，文化可以认为是超时空的符号与隐喻的关联。在文化的直觉产生之前，在纷繁的信息成分互动过程中，有时会呈现由暗示与隐喻构成的无数“中间站”现象，逻辑的与直觉的思维都要整合主体所感受到的或明或暗的信息。在古今传承的伦理与组织性文化中，传统道德哲学与文化制度模塑了一般性文化意识和直觉思维定势。对个人来讲，长期的文化训练与生活体验才能导致良好的

破隐能力与文化直觉能力，这一直觉能力恰恰是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思维传统中建立的。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场合的类同性直觉思维，是人类学家做田野访谈和调查时，以及处理所得到的各种资料时不可缺少的认知能力之一。

至于《银翅》这部书的写法，我当然注意了人类学理论中携带的该学科发源地的文化思维特性。因此，笔者在考察中国社会文化时，主要探索那些与中国文化整体思维相协调的人类学理论，或在运用一些人类学理论的同时，试图发现其跨文化的适宜性或其被修正和被质疑的原因。人类学重视文化的相对意义，那么就应避免人类学理论在不同文化的机械套用。每当撰写文化时，笔者注意的是一个时代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如何尝试导入一种特定的文化并能转换出新思想，否则，若不能洞悉一种文化思维的轨迹，便会发生失败的观察和虚假数字的“证明”与“解答”，这实际存有一个撰写文化的比较与选择问题。

《银翅》采纳了多种写法杂然前陈的构架，有的章节我使用中国文人随笔和民族志形式，有的章节以叙述为主，穿插即时的人物对话，当然也采纳人类学界流行的“标准的”论文格式，不过有时在一章之内的不同小节容纳了完全不同的写法。在随笔民族志穿插学术分析时，可以感受到现代人类学的意义和影响，但当论述中杂以情景对话时，则尽量揭示书中人物在中国文化中的自我以及文化意识与隐喻的贯通。我了解语言学的一般逻辑思维方式，但也了解“文化的逻辑”如何影响思想、认知、推理、言谈和行为的程序。于是在适宜的章节，我有时采纳在一章结尾之处使用类似 Conclusion 的规范的论文写作法。这似乎是面临一大堆读不完的教授指定读物的研究生最喜欢的写法，但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文化思维的范式。然而在有的章节把解释与结论放在需要仔细阅读方能寻获的某个段落中，因为中国人从高中起作论说文和杂文，语文老师就希望学生概括的文章结论位置最好不要太呆板和“太白”，以及应留有回味余地。中国老师的这种指导，我宁可认为是一种写作上的文化模塑，我乐于借助一些适宜的论题，把这种文化